

特載

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詞閉幕詞

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及十四日在台北舉行隆重會議，到中美及歐洲、東南亞、澳、紐、日、韓專家學者二百餘人，盛況空前，成果尤著，茲將本所主任杭立武博士及其他與會人士之開幕詞及閉幕詞，登載本刊，以供讀者先觀之快。

——編者附註

開幕詞

各位大使閣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人至感榮幸與欣喜在此開幕之日，謹代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及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籌備委員會，歡迎在今後數天內將與我們相處在一起的每一位特別來賓、觀察員，以及今天光臨大會的諸位貴賓。

如此衆多來自美國、歐洲、亞洲、澳紐與中華民國的傑出學者專家能夠共聚一堂，確為一盛事。各國駐華使節與中華民國政府、及文化學術界傑出人士的光臨大會，更加充分證實這一點。

這次會議的首要目標，厥為促使中美雙方的學者專家就中國共產黨有關之問題，自由地交換意見及研究心得。我們希望藉此導致中美雙方增加彼此之間更深刻的相互瞭解，與更密切的學術合作。一九七〇年在臺北舉行的第一屆會議，與一九七二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第二屆會議也都是以此為目標。在這第三屆的會議中，中美雙方的與會人士，更將從來自其他國家的特別來賓，分享他們所帶來的學識與智慧。

對中國的研究，幾百年以來，一直吸引世界各地的學者。今天在場的有若干曾參加今年七月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十九屆東方學者會議。該次會議曾慶祝東方問題的學者首度正式集會的百年紀念。當然多年前學者們主要是關心中國的古典學。近年來，其重點自然而暫時地移轉到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

中國大陸自從為共產黨控制亦即必然地變成封閉社會以後，就成了認真與急切研究的主題及對象。雖然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國大陸有了部份開放，

但其社會仍舊非公開的。

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中華民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人士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從事觀察並分析中國大陸的形勢。這個有利的地位是由於三個因素：第一，我們長久與共產黨交手的經驗；第二，我們有許多在別處不存在的的第一手研究資料；第三，我們可以運用我們在大陸上的一些並非一般所能獲得的情報來源。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有些人批評我們在研析中國大陸情勢時不够客觀。自然，當一些問題與我們自身生死存亡密切攸關時，我們無法完全避免情感影響，以致有時會犯了略微主觀的人性上之錯誤。

願一般而論，我相信我們所提供的重要情報及我們就中國大陸問題所作的判斷，仍足佐證我們在這個學術研究領域中的權威地位。

但由於大陸竹幕的有限度的逐漸開放，這個情勢現在已略有改變。官方或私人個別或團體經過選擇後，已被陸續准許進入中國大陸參觀有限的地區，或者參加安排好的旅行。一個人看到、聽到、以及直接接觸到的一切，自然有助於其對情況的瞭解。這種第一手的觀察，自然是我們此地中華民國的中國人所無法獲得的。然而我們自己原有的基本有利地位，却並未因此而失去。比方說關於林彪事件，我們曾揭露一些重要的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毛林之間權力的鬥爭。當我們第一次在此地公開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時候，其真實性頗為西方世界所懷疑，但最近却在周恩來本人於共黨十大大

會中所作政治報告中獲得證實。

我們承認在瞭解中國大陸一般情勢方面，我們所擁有的基本利便，也許不能全部抵補那些親訪大陸人士所獲得之便利。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在中華民國的人士無法完全避免可能有的主觀一樣，那些並未具備相當背景而訪問中國大陸的人士，也可能會輕易地相信中國大陸上的種種宣傳與偽裝。新近開放的中國大陸早期訪客所發表的一些誇媚的觀感，有如洪水氾濫一般，然而在這個風潮過後，目前訪問者關於大陸情勢所作的觀察似乎漸趨平實。

我們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專家們，有責任在觀察事實及從事判斷評估之際，儘最大努力避免發生錯誤。身為大陸問題的研究者，我們都知道所謂的事實並非全如其外表所顯示的。我們也知道我們所下判斷，常是根據一些在別的學術領域標準下，可能被認為是極端不完整及不充分的證據。事實上沒有任何個人、組織或團體，能夠擁有全部我們應該擁有足使我們就大陸問題，從事正確而有用的工作所需情報或資料。因此我們期望藉着彼此經驗、知識與智慧的匯合，使我們自己及在我們選擇的研究範圍內的其他人士，都可獲得相當大的益處。第一與第二兩屆會議共同的目的就在於此。

在中國共產黨政權重大變遷、以及許多新的國際情勢演變後，我們展望第三屆中美大陸問題會議的舉行將如前兩屆一樣地成功。相信這次會議在為學者們提供切合需要的貢獻上可能超越前兩次會議。自然我們對某一局勢的評估必然會存有歧見，這種歧見乃是由於背景不同及利益有別所致，但也正由於表達這些不同意見，可有助於我們這次會議的成功。

這些會議的所以成功，是由於下面幾個原因：首先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自由人，能夠自由地思想並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其次因為我們都是探求，並珍惜奠基於事實與理性上的真理。自由與真理乃是我們共同努力的雙重基礎。

在這一方面，我要特別利用這個機會，歡迎從國外來到中華民國的諸位貴賓。我們希望諸位體驗到此地完全自由。我們希望諸位自己去親身觀察我們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並且希望諸位向我們指出諸位願意提供的觀點或建議。我們並不否認，自從中共展開乒乓外交以來，我們在國際間所遭遇的挫折，對於我們是嚴重的打擊。我也毫不遲疑地告訴各位，我們正以沉重的關切，注意美國與我們所不能和解的敵人之間，進行的所謂

「關係正常化」。我們只能希望美國政府將信守其對我們多次提及的保證。到目前為止，在面對國際局勢新的挑戰，我們已盡其最大的努力，但我們並不存有幻想，以為中共將放鬆推行其孤立中華民國的政策，並且我們也必須對任何不利局勢的新發展提高警覺。

至於我們本身，非但下定決心並且也堅信，在我們與中國共產黨長期鬥爭中，我們將在兩項重要的基礎獲勝：那就是我們可以替中國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與更好的生活，這兩點是現代人類普遍的需求。

無可置疑地，臺灣的人民比較中國大陸的同胞享有更多的自由，並且此地的生活水準也遠較大陸為高。

雖然由於面積與人口相差懸殊，如將我們臺灣這二十年來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發展，與大陸在同一時期內情形作一比較，也許是不太公平，然而如將國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被日本侵略以前的十年間，在教育、科學、醫藥、公共衛生、交通、工業與財政方面所獲之成就，與共產黨過去二十多年在這些方面的成就相比，應當是相當公平的。我們可以立刻看出前後兩者的不同，甚至不必要討論後者的代價如何。這種不同在於兩者制度的迥異，而其中重要的一項：自由企業制度顯然要比極權統制優越。此在中國大陸及臺灣都可獲得證實。

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在臺灣所能做到的已感滿足。相反地，我們過去的成就及我們的現狀，只應做為推動我們未來更多努力的基礎。深信諸位在此地所看到的，將有助於諸位瞭解，為什麼中華民國的一千五百萬人民決心維護他們的生活方式，而堅決抗拒中國大陸的集權統治。我們信奉 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以之做為我們政府的最高指導原則。但我們完全摒拒不合中國國情的共產主義，並且我們在孔子思想與所謂的毛澤東思想之間，接納前者而唾棄後者。我們這項熱烈願望，應該為所有自由人同情關切，即使我們將返回故土並收復大陸的願望或許不會同樣受關切。

我們反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生活方式，而堅決維護我們自己生活方式的決心，只能部份解釋為什麼我們特別慎重並堅決反對與中共進行任何談判。

在過去，我們曾與中國共產黨於十年的長期中，進行過六次的正式談判。此外，在那段時期以前的二十年間，我們曾多次試圖與中共合作，但最終果終為分裂。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瞭解太深，我們確信跟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有

任何真正的談判。我們與中共頭目舉行過的第六次談判是在一九四九年，彼時本人適任內閣閣員。我們的代表團赴北平準備與中共進行認真的討論，但是在久候之後，中共向我們提出了二十四項要求——使人回憶一九一五年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並且要我們於五天內全部接受。甚至不顧我們是否接受這些要求，中共的軍隊還是要渡過長江。他們的那些要求等於是投降。雖然表面上中共目前的要求也許不十分猙獰甚至包以糖衣，然而投降——也許一步一步的——正是中共目前對我們的陰謀。

目前中共正呼籲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從大陸來到臺灣以及在臺灣出生的中國人——要他們「回歸」並為「祖國的統一」而努力。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在今天，人們是越來越聰明，而中共的宣傳也就失去了先前的魔力。有許多人或是為遊歷或是為經商會去過中國大陸，但試問有多少人決定留在中國大陸而心甘情願地接受共產黨的統治？

目前的中國大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情勢呢？

三個月以前，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應日華民族文化協會的邀請，籌組一個由二十五位學者專家組成的團體，去東京參加了三天的會議。該次會議是我們與日本學者們第二次就中國大陸問題，互相交換意見與研究心得。第一屆的會議是一九七一年在臺北舉行。

在座的諸位先生想必樂於知道該次二屆會議在九月初舉行時，正值中國共產黨十大大會剛剛結束。在該次會議中，與會人士共同認為中共十大大會的召開，主要是為了企圖結束林彪事件，而中共基本的內在問題並未解決，並且中共領導階層中兩個對抗的派系，業已展開了新的權力鬥爭。該次會議中的兩位中日召集人及幾位評論員，今天都在此地與我們共同參加這次大會。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要好好治理像中國大陸那樣遼闊的領土，實非易事，並且衆多的人口，對任何在發展中的國家一方面是一個負擔。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嚴格地限制他們在處理現代經濟與貿易問題時，所可能做的彈性措施。我們也更應該承認，帶有孔子人道精神與理性主義色彩的傳統中國文化，對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乃是一大剋制。然而中國共產黨政權曾經遭遇及正面臨的各項難題，主要還是其自身所造成。

毛澤東自己應該對所發生的一切，負其主要部份的責任。除了中共的「人民解放軍」，曾在蘇聯的唆使下介入韓戰以外，中國共產黨政權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是以發展中的一個政治實體的姿態相當正常地前進。也許是因為麻醉於成功與霸權中，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展開了所謂百花齊放的運動，其後又迅速地壓抑了任何鳴放。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一個統治者一旦在政治上玩弄了卑劣的手法，他就會因此而喪失了信用，而我們必須記住中國與中國的人民受傳統道德的影響是極深的。

所謂鳴放運動及緊接着的「大躍進」與進犯金門的失敗，導致了毛澤東的退却。其後毛澤東藉着「文化大革命」而展開了他捲土重來的鬥爭，為了要打倒「當權派」，毛澤東採用了危險的策略——動用紅衛兵。我們知道青年不應該被用來做為政治上的一種工具，因為常常會收到反效果。毛澤東果然自食惡果，因此他不得不被迫使用軍隊來鎮壓紅衛兵的動亂。當毛澤東開始覺得軍隊的力量變得太大的時候，他再一次運用了鬥爭和清算的老策略。到今天為止，對軍隊的整肅仍在繼續中，而青年的問題也越來越厲害。

但是本人認為問題的嚴重不在於中國共產黨十大大會未能解決繼承的問題，或是周恩來原先聲明將於十大大會結束後立刻舉行的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尚未能舉行。關係重大的乃在所有這些卑劣的政治手段與整肅之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領導階層的權威與信譽已經大為減低，自中央至各地公社整個政治結構的紀律業已掃地，並且即使是共產黨員的「革命」熱情都業已消失。這些對中共政權的鞏固及持續至關緊要，而目前看來欲重建這些將非常困難甚至幾乎不可能，更何況毛澤東的壽命亦已有限。

因此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一些注意中國大陸局勢發展的敏銳觀察家們，會覺得大陸上的人民自身亦感覺到目前的情勢，只是一個短暫過渡的局面。各個女士各位先生，為了瞭解中國大陸，我們對情勢的搜集必須努力不懈，我們對於事實的認清必須審慎，我們對於情況的評估必須基於學術立場。

雖然我們在出發點及切身利害關係上可能有所不同，然而可供我們一起探索的學術方面共同基礎却是很豐富。讓我們大家在意見、事實與資料的交換上雙方彼此獲益。讓我們大家以智識的活力，開明的心胸與友誼的精神，在我們選擇的研究領域中共同追求更高的境界。

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此次大會籌備委員會，對所有與會的人士，特別是贊助此次大會的團體與個人，表達我們深切感綑，沒有諸

開幕致詞 (一)

錢思亮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這裏開幕，思亮承邀致詞，至感榮幸。我首先要向出席會議的各位學者專家，特別是由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遠道來臺的各位貴賓，敬致歡迎。同時，也要向這次大會的主辦單位，就是主席杭立武先生所領導的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敬表感謝之意。

中美兩國間深厚的傳統友誼，在學術合作方面，已具有很長遠的歷史，也獲致了很豐碩的績效。二十多年來，思亮因一直在國立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服務，所以對於兩國間學術合作的良好情形，有深切的認識。中美學者合作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第一屆研討會，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臺北舉行，固然只是三年以前的事，可是這三年來，由於雙方有關機構和學者，儘量的相互提供資料，充分的交換意見，並經連續輪流召開大會，共同研討，所以這一方面的合作研究，同樣的有了豐碩的成果。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對於雙方都是有益的。

這次舉行第三屆會議，又承各位學者踴躍參加。我們在聆聽各位高明的見解之前，基於下列的理由，深信這次會議必然會有更進一步的成就：

第一，近年來，大陸共黨政權幾項驚奇的事件，一定已加深了各位對他們真實面貌和特質的認識。在政治方面，最令人震驚的事件，就是當年曾經被公開宣布為毛澤東摯友和接棒人的林彪，竟繼劉少奇之後，遭受了鬥爭而至神祕的死亡。接着，同樣使人驚奇的是一名不見經傳的王洪文突然被提陞為中共組織的第三號重要人物。在文化方面，如火如荼的掀起了反孔運動，同時對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暴君秦始皇，尤其對他焚書坑儒的暴行，竟大大的加以頌揚。這些驚奇的新事件所表徵的真實意義，當有助於一般人對中共本質的深入瞭解。

第二，這一兩年來，外國學者已有機會到中國大陸作私人訪問，得以直

位的合作與支持，此次大會幾乎不可能實現。

最後，容本人敬祝來自國外貴賓在此地短期的旅行愉快有益。謝謝各位。

接觀察中共竊據下的情況，獲致耳聞目見的資料。在共產制度下，那些專供外國人士參觀的地區和設施，固然多是預經劃定、佈置、和偽裝、安排的；但在多數是深具學養的外國學者，以敏銳的眼光分析之下，仍能或多或少的獲得一些反面的真實資料。這些外國學者對於中共政權的對內壓榨、對外欺騙侵略、和大陸人民精神物質生活的苦難情況，必然增加了更深入的瞭解。在座的美國學者中間，可能也有好些位到中國大陸訪問過，一定會在本次大會中，提供觀察所得的報導和意見，增加互相印證所必需的資料。

大家都知道，學術研究方面有價值的收穫，常能在實際運用中，產生良好的效果和深遠的影響。這幾年來，中美兩國學者積極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成就，在學術上所表現的珍貴價值之外，對於中美兩國在當前國際局面中所負的責任，乃至對於世界人類的福祉，都將有所貢獻。說到這裏，思亮對於各位學者，更深表欽佩。

最後，思亮要再提一下，中美兩國由於悠久的傳統友誼，推進了學術合作；也由於密切的學術合作，加深了兩國間的敦睦友誼。大陸共黨政權顯然是中國、亞洲、甚至世界禍亂的根源，因此研究「大陸問題」是時代的使命，也是歷史的大課題。今天來此共同研究「大陸問題」的各位學者，實在是任重道遠；各位的工作對於當前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和下一代的禍福具有深切的影響。所以，我們深信各位，一定能隨時隨地誠摯的交換資料，溝通意見，以期澈底的找出大陸問題的癥結，獲得真正的瞭解。我們更希望今後的研討會，將能繼續輪流召開，保持經常的交往和接觸。可預見各位學者之間感情的繼續增進，將更促進中美兩國的深厚友誼，學術的密切合作，以其謀兩國的福祉。

還有，各位遠道來臺的學者專家，對於這裏的進步情形，一定很有興趣，希望各位能騰出時間，到各處看看。

開幕致詞 (二)

吳克

杭主任、各位貴賓、各位參加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代表們：
本人此次參加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並代表美方出席人員致開幕詞，深感榮幸。由於曾參加第一、二屆兩次大會，本人可在此保證，與會各位必將於此次大會中獲取豐富與寶貴之經驗。大會充分之準備工作同時使我們深信，與會人員之一切均將受到妥善之照顧與安排，而使我們能專心致力於大會所定各項議題之討論。

瞭解中國大陸上的發展，毫無疑問地是我們大家面臨的一大急務。這些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到中國文化中的每一成員，同時也間接地影響到世界上的每一個人。因此個人對各位來自其他國家的卓越中國問題學者之能參加並擴大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特感欣慰。我們都需要充分地分享我們研究的成果及有深度的見解，並盡量地利用合作所能產生的效益。根據過去兩次大會的經驗，我們特別對中國代表就今日大陸各種角度、各種問題上所貢獻的知識與坦率、珍貴的見解表示謝意。文化背景經常能提供最嚴謹的邏輯學或最精密的電腦計算機所無法提供的研究方法，更何況文化形態常根本不是邏輯所能解釋的。但它們實在有持久性、影響力、以及歷史性的份量。

在過去廿五年中，我們曾收集到相當多有關於中國大陸在共產主義統治下各種情況的消息，同時也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確實性。譬如我們知道大陸上的農業問題仍很嚴重，我們察覺到整肅幾乎是大陸生活中經常面臨的狀況，同時我們也確知傳統的中國文化實在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持久性。正在大陸上進行的反孔運動，更證明了中國人民心目中都有孔子「仁」的概念，而不是毛澤東的「鬥爭」思想。

在另一方面，過去三年中，毛共雖似略為放寬了與外界的接觸，但實仍保留着極度的祕密性與不可理解性。中國大陸高階層統治階級的政治仍具下

列各項特色：如神秘的象徵主義、奇特的聯合、突然的轉變、祕密的發展，以及看來像是反覆無常的個人衝突。中國問題觀察家經常發現他們相當確定的論點，在俄頃間被推翻得煙消雲散。多少人真正預測到「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多少人料想到劉少奇的垮台、林彪的死亡、或者是鄧小平的復出？對於毛澤東死後的大陸，我們又有那些確定的準則作為分析的參考呢？

非常不幸地，中國大陸仍然是蘇俄名小說家阿歷山大·索盛尼金所稱的「滅音地區」。在他動人的、但未被准許發表的諾貝爾桂冠演講詞中，他對「實體上已被壓榨及束縛的世界，在精神上亦不被准許融和」，以及「知識與同情兩個分子無法互相流通」感到憂慮。他有一段描寫蘇俄的話可以很恰當地用來形容今日的中國大陸，他說：

「這就造成了地球上各地間消息閉塞的一大危險。現代科學告訴我們，消息的閉塞會導致熱力以及全面的毀滅。消息的閉塞使得國際條約及協定都變成毫無意義；在一個滅音地區，任何條約都可以被輕易地重新加以解釋，甚至更簡單地把它置之腦後，如同它根本沒有存在一樣……一個滅音地區，過去和現在一樣，住的都好像不是地球上的人類，而是從火星上來的長征軍；他們對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毫無正確的瞭解，但在自認為『解放者』的神聖使命下，準備把地球搞得天翻地覆。」

在我們今後的討論中，我們也許能領悟到如何進一步地擴大與中國人民的接觸，那麼他們也許可以衝出他們的「滅音地區」，或者知識與同情更進一步地互相流通。但在一個關閉社會所造成的重大阻礙下，我們必須根據最深切之瞭解，來制定並執行明智的政策。

因此我們熱切地期望着未來幾天內意見的交換。臺灣不是一個滅音地區；否則這樣一個大規模的集會，包括背景不同的代表，討論各種不同的議題，就不可能在此召開了。當這種公開討論中國人民及其前途問題的會議，能

在中國大陸舉行的時候，我們就不必再感到隔離了；大眾傳播和新聞自由可以打開這個社會，同時中國文化對現代世界的偉大貢獻，亦將再度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我想這就是促使我們大家聚會在此的希望。

閉幕詞

杭立武

各位貴賓、各位同仁：

經過五天討論之後，我們的會議告一段落。這次會議中，中外學者們一共提出了三十六篇有關「大陸問題」各方面的論文。我敢相信，這次會議可以稱爲是一次圓滿而成功的會議。我們這次有許多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國家來參加會議，大家共聚一堂，商討一個共同的問題，單憑這一點，就使我們獲益匪淺。

我確實相信：學術上的接觸是非常有益的。在民國十多年的時候，我很幸運的能有機會在我們中國第一所暑期學校裏接觸到杜威、羅素、康有爲、梁啟超、章太炎各位先生，雖然有時候我還不能完全瞭解這些大師們的理論，可是能接近他們的春風化雨，聽他們的宏論微言，確實也使我打開了智識上的眼界。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很幸運的能有許多世界一流的研究「大陸問題」專家學者來共作討論，我相信在過去幾天的接觸當中，必然是大有切磋之利。

這次會議的成功，就在於能透過討論與意見交換而獲得對於「大陸問題」的進一步瞭解，這也正是我們舉行會議的目的。同時，這些的接觸與意見交換也必然可以促進個人之間與團體之間接觸與合作，這也是這次大會的另一收穫。

這次大會和以前的兩屆一樣，充份反映出「大陸問題」的重要性，以及運用集思廣益來研究這個問題的需要。「大陸問題」不僅是重要，而且也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因爲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被封鎖的社會，同時也含有許多激烈而迅速的變化。當然，整個世界上也有許多重大而迅速的改變，可是在自由國家裏的改變每每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預見預知，縱然有時候不能事先預知，但也容易在事後去追溯或者在當時立刻發覺。可是在中共暴政

最後我願重申能參加此次大會之開幕式以及以後全部議程，深表榮幸與感謝。

之下的大陸却不是這個樣子。

「世界列強，逐鹿亞洲」，這句話形容得很好。亞洲既已成爲列強逐鹿的場所，我也深信：我們中國掌握着亞洲和平與安定的鎖鑰。只要參考一下近代的歷史，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得勝利的中華民國，對於若干新國家的建國立國具有決定性的貢獻，例如中華民國曾經阻止了四強武裝佔領日本的計劃。即令在政府撤守台澎金馬之後，中華民國仍然是嚇阻中共公開侵略的重要力量。當中華民國在加強本身力量的同時，它也對東南亞自由國家的穩定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就另一方面而言，中共在建立偽政權不久之後，首先立刻介入了韓戰，然後又破壞了中印間的傳統和平，不久又煽動與支持北越和越共的侵略與叛亂。

在目前這個局勢不定的世界裏，有些人希望運用「勢力均衡」的手段去獲得某種程度的秩序和安定。這些舉動本來不能說是毫無意義的，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和共產國家及政權間所建立的「勢力均衡」必然是極端的脆弱而不可信賴。現在已經不是十九世紀奧國梅特涅的時代了，在那個時候，一場列國間的勢力均衡還可以維持幾十年的和平，或許是更長一點。

舉個例子來說，今天我們有誰能夠預見大陸上勢力集團間的幕後權力鬥爭將有什麼樣的發展？在這種內部權力鬥爭中，軍人勢力又會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在毛澤東死後經過一場必然的天下大亂之後，更將發生些什麼事情？

再進一步說，今天所謂的「勢力均衡」，主要是運用中共與蘇俄間的利益衝突。可是這個基礎是必然脆弱的，因爲誰能假定這個情勢不會改變呢？當然，只要毛澤東在世一天，匪俄衝突似乎不會改變，但在毛死之後又將如何呢？

目前美國確實是在推行所謂「緩和」運動之下可以「悠然自得」。這個「緩和」是一方面與蘇俄友好，另一方面與中共建立價值關係。可是美國也跟別人一樣的清楚，蘇俄所容許的「緩和」只是有利於達成它統治世界的「緩和」，同時中共所要的與美「連絡」無論在時間上，在程度上都有限度——也就是說一旦匪俄衝突減低，一旦中共的工業和原子能力獲得充分發展，這項「緩和」的需要就消滅。

自由世界也都充分瞭解：無論是蘇俄與中共都沒有改變它們的基本政策。同時自由世界更是知道：在中東的十月戰爭，衝突中有談判，談判中又有衝突。

總之，中共與蘇俄是多變的因素。反之，中華民國却是穩定不變的，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都可信賴它堅決的站在自由、民主，以及自由經濟一方面。在目前這個強調「協商」的時代裏，自由人民每每不願自認反共，而共產份子却仍狂妄地謾罵自由世界，我們願重申我們堅決反共的決心與信念。確實的，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餘年來，在國際政策上一直堅守原則，我們永遠堅持反對侵略贊成國際合作。

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就譴責侵略，同時也決不承認由侵略所得的結果。在那個時代所形成的道德信條，一直在中國歷史上支配、滋潤着我們中國人的思想。

談到「人際關係」這方面，道德上的考慮更對我們具有支配和影響力量。這些道德上的考慮因素，當然是遭受中共所謾罵的，他們認為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中共之所以攻擊這些道德觀念，正因為它們就是馬列主義和所謂「毛澤東思想」的解毒劑。

可是我們却正從孔子學說所代表，傳統中國文化所蘊含，以及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着重的這些倫理觀念中獲得力量，同時這也就是我們制訂政策的基礎。

我們從歷史事實中證實：傳統中國文化不僅經得起多次考驗，而且每經考驗必能更為發揚光大。因此，代表傳統文化的中華民國，不應被犧牲而且永將屹立。

說到這一點，我們應該提到美國宗教傳統與背景及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是我們充份瞭解的。

我們需要美國與自由世界，也許正如美國與自由世界之需要我們，甚至目前正在試圖建立一個可行的權力均衡中仍然如此。

時間並不必然就對共黨有利。隨着時間的進展，中國大陸上的各種情況和共產集團的意圖，也會愈為明朗。當我們越瞭解共產主義與共黨的所做為，我們越能瞭解自由國家間與自由人士間的接觸、諮商與合作的必要性。

經過幾天的熱烈討論，我們不僅彼此獲益良多，而且彼此建立了學術上與個人的友誼。朋友是孔子所提倡的五倫之一。我相信大家都珍視友誼，可是唯有在開放的社會才有真正友誼的存在；閉鎖的社會決不容許人與人之間建立、表示、甚至談論友誼，特別是與外國人之間。在我們這裏對朋友是竭誠歡迎的。當外國朋友來到台灣，更使我們想到孔子所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一句話。

在閉幕典禮的當中，我不禁聯想到將來，我已然想像到我們將在美國所舉行的下一屆會議中見面。

世事是多變的！在那些被獲得諾貝爾獎金的俄國小說家所形容為「滅音地區」的國家裏，許多難于逆料的事件可能發生。因此，我們下次會議，應該比前三屆的間隔來得更短。

以後的會議應該如何安排呢？當然我們仍然要提出論文，可是在分組討論之外，是否可以增加若干小組研討某些專題？這祇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歡迎各位提出寶貴意見以作我們將在一九七五年所主辦的會議的參考。

我可以慷慨的對第五屆會議答應許多諾言，因為那時候我也許不在國際關係研究所了。但是我目前至少可以做一兩個可靠的保證：第一，我們可以從這次會議缺點上獲得許多教訓；第二，我們要儘可能採取「同時翻譯」的方式。最後，我感謝各位的蒞臨與合作，並且對於我們大大小小的接待不週，表示歉意。謝謝各位的大量寬容，並祝各位在此後兩天的各地旅行以及歸國途中的愉快和健康。謝謝！

閉幕致詞 (一)

史格爾

杭主任、各位貴賓、各位參加會議的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人謹代表與會人員對杭主任及主辦單位對我們在台期間的熱誠款待，和大會所表現的效率，致以最深的謝意。

雖然我們來自世界不同的角落，但我們的精神却是接近的，這種精神上接近，並不表示我們的意見上的完全相同。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彼此感到如此親近的原因，因為我們都相信歧見的存在，並且也藉這次大會而表達了這些歧見。對於中國大陸所曾發生、正在發生及將來發生的事情，我們的看法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這次大會却能使我們這些來自美國及其他地區的與會者，能和中國代表們在友好及客觀的氣氛下共同討論研究有關中國大陸的各種問題。這種會議是無法在中國大陸召開的，因為馬列主義不容許有自由及公開的討論存在，這一星期以來的討論更使我們認清了這個事實。

自二次大戰，特別是韓戰以後，美國及其他地區的學者，在促進中國大陸研究方面，佔着主要的一席。但是，不容否認的，基於對中共政權鬥爭的政治需要，中華民國的學術界在這項研究的領域中，一直維持着領先的地位。中國的學者一向以擁有珍貴的資料及卓越的研究著稱。不可否認，中國的研究機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文件，這些文件中，有些甚至連中共本身都沒有保存。

這些文件與中國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對中外學者都是價值連城的。像其

他研究機構一樣，我所服務的中蘇研究所透過多種交換與合作的計劃，得到了這些文件與研究成果。

在這裏我要特別提到這次大會的主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在杭主任及前主任吳俊才教授的領導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貢獻良多，該所的出版品，如問題與研究、匪情月報及中共人名錄等，都為世界各地的學者提供了重大服務。

我願藉此機會謝謝該所及中華民國其他類似研究機構對外來研究學者的鼎力協助。這些機構同仁的照料與關懷使我們永誌在心。

中國古書詩經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此次會議的進行及其成就適可印證此語。臨行前，本人謹代表非中方代表向杭博士及其屬下同仁表示謝忱。感謝諸位提供機會，就中國大陸問題交換意見。此次會議對於吾等日後研究工作定將助益匪淺。本人確信彼此之間仍將維持密切合作關係以促進研究的進展及準確。

華盛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深信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將促進彼此之間更密切的合作。為求以具體事實表示此種信念，本所已決定於明年主辦下屆，即第四屆中美大會。本所樂於有此機會貢獻一份力量，促進彼此對一個複雜而封閉的社會的研究與根本認識。

謹對杭博士在過去一週的款待重申謝忱。

薛光前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同仁、女士、先生：

本會經五天順利的研討以後，一如以往兩屆的成例，宣告圓滿結束。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忝為贊助單位之一，敬代表本校及美國方面的其他贊助團體，向此次與會同仁表示深切的感謝。由於各位同仁的寶貴貢獻，得使對於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獲得進一步的認識與瞭解。

閉幕致詞 (二)

欲瞭解中國，特別關於大陸的現況，一如衆知，實非易易。以往二十餘年中，西方一般所謂「中國通」撰述有關大陸的著作，為數甚多，但其中足供今日仍有重讀一遍之價值者，究有幾何？正如吳克教授在他的開幕致詞中指出：「中國問題觀察家經常發現他們相當確定的論點，在俄頃間被推翻得烟消雲散。一九五〇年代，大家都說劉少奇當家，及其所謂「蘇共中共堅強

結合」。一九六〇年代，大家又說是林彪當權，及所謂「北京莫斯科對抗火拼」。居今一九七〇年代，則為周恩來獨佔上風，使用翻雲覆雨的手法，製造了全般混亂的局面。

這混亂的局面，使紐約時報名記者塞賓柏格於十一月廿八日的報導中，承認在撰述若干有關中共的文章感覺後悔以後，套用莊子的話，希望本人「知其愚者，非大愚也」，同時坦認中共的真相，并非像他以往想象中那麼的出色！

我記得大約十四年以前，當美國一般輿論，傾向於遜派一批記者到大陸採訪新聞時，我給紐約時報的主編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登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卅日的紐約時報上。在這信中，我對於這種建議，表示十分懷疑。因大陸在中共統治下并無新聞或報導自由。同時我強調假使美國人民有獲知新聞的權利，他們有更大的權利，不給不正確的報導所迷誤。很不幸的，我這封信並沒有引起一般充分的注意，隨後有前往大陸的西方記者，歸後頗多後悔備受欺騙，虛此一行。

這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經的一段話：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以是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經此會議之後，一如杭立武博士在開幕詞中，很正確的預期，由於學術的研討和自由的交換心得，我們用不着親身去大陸，也瞭然於大陸遭遇的情況和面臨的種種難題。因為天下的真理，必須憑天道、天理和人性的考驗。「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就是今天中共政權在大陸上的真相！

最後，我願代表美國方面所有贊助單位的同仁，向這次主持會議的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特別是杭立武博士，表示深切的謝意。完全由於他的宏籌擘劃和主持有方，才使這次會議達成預期的目的和獲致出色的成功！

我們更要感謝參加這次會議的一般中國學者，由於他們寶貴的經驗、學識和第一手的資料，使從國外來的同仁，獲得許多不易從其他方面獲得的知識。一如史塔爾博士在會議的開始時，就很鄭重的指出：「中國學者確實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是外國學者所未具備的。中外學者間之密切合作，將會大大地改進中國研究的素質。」我們深信這第三屆會議已朝向這方面更進一步。

此外，我們從美國方面來參加的同仁，願向招待我們的機關團體，表示深摯的感謝。他們的盛情厚誼，當永誌不忘。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們能在美國報答他們的一番厚意，不勝企幸之至。

蘇俄及其附庸

本書內容，主要包括「蘇俄歷史」，

「蘇俄黨政現況」，「蘇俄外交」，「蘇俄文教現況」，「蘇俄經濟」，「蘇俄軍事」及「附庸國家概況」等七篇，均係當前國內第一流蘇俄問題專家集體著作，取材確實，立論嚴謹。二十四開本，計四二面，平裝一冊，定價新台幣陸拾元整。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